

何炳棣 著

徐泓 译注

明清社会史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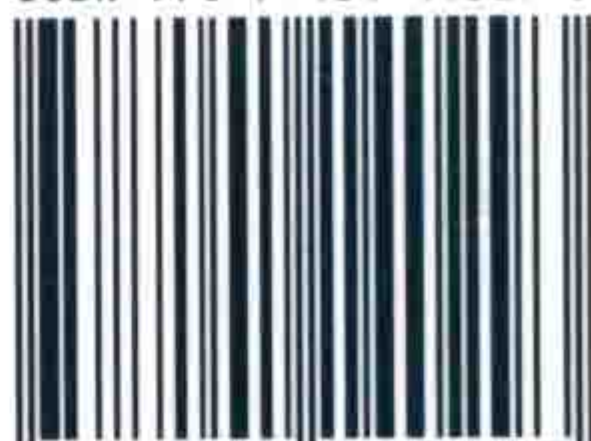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在本书中，何炳棣先生采用近100种科举史料，以计量法统计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关键性史料，分析进士及举贡4万个案例，并运用社会分层化和社会流动理论，解释明清科举制度与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紧密联系。并以律令、方志、传记、家谱、社会小说等大量文献，观察明清两代社会与家庭事务，探讨社会流动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会概念，深入地诠释了科举体制下的社会流动。《明清社会史论》是何炳棣先生的经典之作，对明清时期科举、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研究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译者徐泓先生，中国台湾地区暨南国际大学荣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客座教授。本书的翻译，既专业又准确。尤其难得的是，徐先生增补了长达万言的译者注，详细查对史源，列举并评介过去几十年间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的各种论著，这为广大读者理解何先生英文原著提供了重要参考。

ISBN 978-7-101-14029-3



9 787101 140293 >

定价：120.00元

何炳棣 著

徐泓 译注

明清社会史论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社会史论/何炳棣著;徐泓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9.9
(何炳棣著作集)

ISBN 978-7-101-14029-3

I.明… II.①何…②徐… III.社会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0311号
北京市版权登记号01-2019-5452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by Ping-ti Ho, Copyright © 1962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Zhonghua Book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明清社会史论
著 者	何炳棣
译 注 者	徐 泓
丛 书 名	何炳棣著作集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201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31½ 插页2 字数550千字
印 数	1-4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029-3
定 价	120.00元

明清社會史論

何炳棣自題

出版说明

何炳棣先生,著名历史学家。1917年4月6日出生于天津。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考取第六届清华中美庚款留美公费生,1945年赴美。1946至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英国及西欧史博士课程,通过口试,1952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48—196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1963—1987年)、美国鄂宛加州大学(1987—1990年)。1966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1975至1976年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2012年6月7日,在美国加州家中去世。

何炳棣先生自幼在“亲老家衰”的自我压力下,发奋读书,力争上游。博士毕业后,即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关于明清人口及明清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研究专著,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60年代末,何先生的研究兴趣转入中国农业的起源,并进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中国文化的起源上。《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何先生在深思熟

虑后,决然投入先秦思想史领域,选择“攻坚”,研究中国思想史中最关键的基本课题,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何炳棣先生一生治学,从不做“第二等”的题目,向来“扎硬寨,打死仗”,视野宏阔,博征史料,而著述则精要严谨,下笔必有建树,且数十年坚韧不拔,孜孜不倦,故成就卓著,贡献杰出。

何炳棣先生与中华书局交往密切,晚年拟将毕生著述加以修订,交付中华书局,以“何炳棣著作集”之名,系列出版。其主要学术著作,多用英文写作与首次发表,其中部分已被译为中文,皆应收入“著作集”中;未译为中文的,待译成后再行收入。而晚年有关思想史方面的系列论文,为何先生一生学术的“画龙点睛”之作,则均以中文写成,编为《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收入“著作集”中。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何炳棣先生未能完成全部修订工作,更未能亲见“何炳棣著作集”的出版。好在,学术可以长存。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2月

中译本自序

我所写的第二部著作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简译为《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书于 1962 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 距今已近半世纪矣。我生平治史素重选题, 始自明清, 上溯宋金的人口、大北魏洛阳城区; 数年之后又自修多种科学工具, 于 1975 年以英文完成《东方的摇篮: 公元前 5000 年至 1000 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 一书。之后 30 年间, 中国各地丰富而多彩的考古发现, 帮我驳斥了西方与东南亚人类学家以及考古学家对《东方的摇篮》的恶意攻击。上世纪末, 我先后自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退休后的 20 餘年来, 又另辟领域, 专攻先秦思想史与制度史, 对数十年前已经问世的有关明清人口以及社会阶层间流动的旧著, 不免有点陌生之感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 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在过去数十年间先后主持台大、香港科大、暨南、东吴等大学教研工作之余, 致力于

拙著《明清社会史论》的译注工作。徐注的特色是力求详尽,例如我在原书中提到明太祖开国伊始,由于亟需人才,往往数以百计的国子监生,无需较高的功名,即可出任州县,甚至可当更高的地方或中央官吏。但是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后,明英宗被俘,蒙古入侵京郊,明政府遂自景泰元年(1450)起,不得已颁发一系列的谕令,准许纳马纳粟即可入监读书,初限生员,倏而惠及一般庶民。此后19年间捐监者共6,869人,占全部监生16,070名的42.6%,导致州县底层吏员供不应求的现象,降低了监生的社会地位。我早年治史多在美东国会、哥大、哈佛等汉学图书馆,遍览多种史料,而叙事则力求简要。上引史实仅采自简明可信的《明会要》,徐注除《明会要》外,详列《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明史选举志》、黄瑜的《双槐岁钞》、其孙黄佐的《南雍志》、《明英宗实录》,以及近年郭培贵的《明史选举志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此一脚注长达八九百字,足以教导入门者如何收集与运用史料。

译者注释详尽,无意中大大改善了英文原著中的排印次序与方式。事缘上世纪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出版社和许多学术期刊,为了节省经费,把正文与脚注中的所有汉字,照例挤排在书尾。即就这本《明清社会史论》而言,成千上百的中文人名、地名、年代、官名、科名、书名等等,阅读时必须往返检索,不胜其烦。徐译将全书每一脚注都与同页正文密切联系,读来令人重生亲切之感。

长达万言的译注,详列并评介过去几十年来凡涉及明清社会阶层、结构与流动的各种文字的专书与论文,对我这个原作者以及广大读者都极有参考价值。除了《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一书

外,我从不回头深究旧著,所以 1962 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后,未再注意这方面的著作。在华府与台北关系恶化,两岸极度紧张的政治情势下,我虽尽最大努力,仅得 80 种具有登科者三代履历的名录,可用以分析明清两代一万四五千名进士和晚清二万五千名举人及特种贡生的家世背景。我曾几度函请宁波范氏天一阁提供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缩微胶片,都无结果;不料《译者序》中提到竟有大陆学人抨击拙著弱点之一是未利用迟至 2006 年才由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

至于《译者序》详列各种文字所写与拙著类似的专著,或由拙著启发的论文,其中对我早年的方法、观点、分类、量化等等,都不免有所批评或质疑。这些批评与质疑或为我前所不知,或久知而不答,或迟迟才作答,之所以如此,因我近年将精力专注于先秦思想史的攻坚。然而对于早年著作所据原始史料之丰富多彩,以及论证之平衡有力,仍具有相当信心。《明清社会史论》从三万四五千例案中所得出家世背景的分类和量化,应与明清 500 馀年社会阶层间之流动率,大体相符而不悖。《译者序》谓拙著“无论在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仍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此一评价乃译者比较 1962 年以来中、日、韩类似著作后所得,是接近事实的。事实上,当英文原著出版后,即已获得高度评价,如名闻寰宇,主编《剑桥中国史》的杜希德(译者按: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自订汉名原为“杜希德”,或译作“崔瑞德”)教授,早年曾在他主编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集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发表书评,对拙著推介如下:

This is a brilliant book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same author's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provides the English reader with the best outlin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ing and Ch'ing China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the author combines first-rate Chinese scholarship wit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 lively creative imagination, and a sharp eye for telling illustrative detail. (这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与同一作者所写《中国人口史论 1368—1953》,* 均为英文读者提供了在所有文字中最精要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纲。此书作者之所以能达到第一流水准,由于他能兼通中国传统学问与近代西方史学之长,且具充沛的原创想像力,并能以敏锐的眼光写出动人的案例。)

徐泓的序与杜希德的书评对我早年学术著作价值的肯定,不啻是我近 20 余年来,孜孜不倦考证先秦思想与制度的精神支柱。

这本《明清社会史论》在我所有的著作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较多,也最为谨慎,曾引起不少学者仿效。但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最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类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因此我自

* 【译者按】:何先生自题《中国人口史论》,中译本改名《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北京:中华书局,2017)。

退休以来 20 馀年间,“仅”求诸己,致力于考证学的更上层楼,欣然颇有所获。此日回想,这本旧著可称我个人学术路程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今旧著以“译注”的新颜出现,于我个人固然可喜,更希望对广大的中文读者有所助益。我当然也要感谢徐泓教授不懈的努力。

我于序文撰就之后,重阅《译者序》,发现第三章第 126 页注 2 译者按语谓拙著当初不利用朱卷,是由于潘光旦和费孝通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 9 卷第 1 期(1947 年 10 月)上合撰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文中引用了晚清直隶、江苏、浙江、山东诸地朱卷 917 种,而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仅藏有 300 多种。我几十年来不曾公开讨论朱卷的史料价值,实因雅不愿与潘仲昂师(译者按:潘光旦)、费孝通学长辩难,当初友朋之中有瞿同祖兄(2010 年 6 月在北京逝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朱卷即使具有种种优点,并不是研究社会阶层间流动的理想史料。朱卷大致包括两个部分:谱系和师承。谱系详于直系与近支,兼及母系各世代的姻戚,故能“追寻各家婚姻结合,推见各家生物性的关联”。师承包括朱卷作者的学术源流,详述受业、问学、授知三种有关个人的思想和成就。类此生物和社会教育并重的资料有利于潘先生对遗传与优生学的探讨。然而朱卷的内涵即使优于家谱,若不能置于朱卷作者同年的全部齿录之中来看,仍无法得出社会阶层间流动率的统计。其中至理,容后有馀力时再详论之。

何炳棣

于美国加州尔湾龟岩村

2011 年 12 月 26 日

原著第二版自序

我在第二版校正了许多排版和数据及史实的错误,在此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汉学荣誉讲座教授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 Dean Lung Professor Emeritus),因他惠予提供本书第一版的勘误表;他以自己主持“《明代名人传》编写计划”(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所累积的大量资料中撷取资料,来校正拙作中若干明代官员与学者的年代与生平事迹的疏误,这几乎是别人无法办到的。因拙于校对,这些版本的校订大部分要归功于富路德教授。

这一版最主要的修订在于统计数字,在这本书的书稿交给哥大出版社后不久,我才收到邮寄误期迟到的1958年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让我非常惊喜的是: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进士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的书目,而且都记载着举子先人的信息,可以填补先前我的统计数字系列中某些关键年代的空隙。这些极为珍贵的登科录、会试录和乡试录,原来是翁同龢(1830—1904)的私人收藏,他是晚清两位皇帝的老师,一般被西方人认为是光绪二十四

年(1898)戊戌变法中的关键性“首相”。在最近一次到东亚的旅行中,我也偶然在中研院史语所发现4种稀见的明朝进士登科录;结果我就利用这些新收到的资料修正与增补表9、表10与表12,这几个表是本研究的统计经线中最值得注意的。

本书出版以来,相关的二手研究成果增加了许多,虽然不是直接接触及明清中国社会流动问题,但是与本研究讨论的某些制度面相关,在此只提几件: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1)是至今研究明代黄册制度史最详尽的著作;贺凯教授的《明朝政府组织》,《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1卷,1958年12月(Charles O. Hucker,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XI, December, 1958),直到我交出书稿时仍未出刊;这篇文章的许多好处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明朝主要和次要政府机构与职官名称的英文译名。我自己的中文著作《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专章论述各地商帮为提供赶考的家乡子弟食宿,在北京与各省城、府城设置的会馆。由于出版经费的昂贵,不可能对本书内容全面重加增补,尤其书目是在日本印的,最为费时。尽管整本书的原来页码有必要保留,在本书第二版,我还是对文本与统计方面做了相当大的改进。

在过去几年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一些社会科学家比史学家与汉学家更不愿有系统地关注各种中国传记资料的不同性质问题,而这些资料却是许多现代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流动的依据。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无疑地是语言文字的障碍,我可以无愧地说:在本书

第三章第一节,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流动,评估所依据的各种中国传记资料,目标是要充分地引起那些不熟悉中文文献资料学者的注意。本书的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结果,认为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原著页 258,中译本页 326)。认为这独一的结论很难估量的学者,就请他们读读狄伯教授(Vernon K. Dibble)和我合写,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学报》第 3 卷第 3 期(1961 年 4 月)发表的《社会流动的比较研究》(一个辩论)。¹

何炳棣

芝加哥,1967 年 4 月

1 Vernon K. Dibble and Ping-ti H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III, No. 3, April, 1961.

原著初版自序

对研究明清社会与制度史的学者来说,能使用的文献不但数量大而且品质非凡。这批资料中最有系统性的是进士登科录(拥有进士功名者几乎自动成为中阶官员),它提供举子三代祖先正确的信息。这里使用的48种登科录等名录,共含12,226个案例,正好涵盖整个明清时代,始于明朝第一次进士考试的洪武四年(1371),终于科举制度废除的光绪三十年(1904)。这些资料构成这个研究统计数据的主体,另外补充清代最后几百年的20种举人与贡生的名簿同年齿录(拥有这些中阶科名者有资格受任为低阶官员),分析的总案例数达23,480个之多,再补充长江下游为主的三种生员题名录(拥有这些初阶科名者并不能受任为低阶官员),其中两种涵盖顺治元年至光绪三十年(1644—1904),另一种涵盖洪武元年(1368)以来的整个明清时期。对初阶、中阶和高阶举业造成的社会流动的统计研究,构成本研究的经线。

本研究的纬线主要包含评量各种形式的质性证据,诸如政府律令、方志、传记、家谱、社会小说和观察当代社会与家庭事务的著

作等等。虽然大部分是不能计量的,但仍然可以阐明社会流动各面向的一般情况,如个人与家庭从一个身份地位移到另一个身份地位,几乎不存在有效的法律与社会壁垒和阻碍;社会流动存在着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著名的家庭和家族都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其社会与经济地位逐渐和其他家庭、家族趋于平等;导致社会流动的某些社会概念与神话,向某些部分人民的渗透扩散等。本书研究举业造成的社会流动及一般社会流动的主要结论,取自累积的统计的与质性的事证所作的注释、评估及总结。

就如本书的副题所指出的,我的研究普遍受益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我必须明确地说:本研究的重点在社会与制度史的一些有机面向,而不是历史社会学。历史资料不论其品质多好、数量多大,都很少能如现代社会学调查所要求的那样;历史学家不能如社会学家一般,以精巧设计的问卷与田野调查的实施来找到特定的资料。此外,统计数据分类和一些社会现象的注释,都需要仔细讨论某些面向的制度史,虽然对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工作是费力而乏味,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却十分重要。因此,本书处理社会流动的各个层面与处理制度史一样多,讨论的焦点则集中于官僚体系的社会成分。为避免读者误解,我曾认真地考虑这本书的副题是否需要改易;最后我还是决定保留这个副题,主要是因为我使用的理论框架,在最近的 15 年里,已为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所扩大和改进。

关于一个跨度长达五个半世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有些相关的论题,可以说,比研究血液循环更具挑战性和启迪性。统治阶级